

# 武后朝与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朝的 华严佛教艺术

王静芬

(弗吉尼亚大学 美术史系, 美国 弗吉尼亚 22904)

**摘要:** 众所周知, 武则支持华严佛教, 影响了她的治世观和她所赞助的艺术, 例如洛阳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像。她的武周朝还吸引了一批外国僧人, 引进带有密教色彩的教义和神祇。华严佛教的教义在七、八世纪传到日本奈良朝, 在圣武天皇、光明皇后统治时至为隆盛。本文首先探讨华严佛教艺术在武后朝与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朝中的异同。武后不仅支持华严佛教, 也推崇密教信仰, 尤其是变化观音。在中土, 不同信仰流派的表达方式有所区分。而在奈良, 变化观音信仰与华严教义互相融合。这种华严教义与具密教色彩信仰的结合, 可理解为对半世纪前武后朝佛教思想的传承与演变。

**关键词:** 武则天 圣武天皇 光明皇后 华严佛教 变化观音

**中图分类号:** K825.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2) 01-0073-18

武周皇帝武曩, 时称武后, 后世通称武则天 (生卒年: 624-705, 684-705 年持政) 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通过佛教对其政权的合法化登上了帝位, 并宣称自己为弥勒化身 (Maitreya Incarnate) 以及转轮圣王 (cakravartin)。在唐朝的统治者中, 武后应该是对佛教最热忱的推崇者之一;<sup>①</sup> 她的武周朝廷扶持了一批杰出的佛经翻译者, 其中包括 693 年来到长安的印度僧人菩提流志 (Bodhiruci, 卒于 722 年)、695 年抵达长安并重译《华严经》的于阗僧人实叉难陀 (Śikṣānanda, 651-710 年)、以及赴印度求法巡礼后, 于 695 年沿海路返还唐都的中原僧人义净 (635-713 年)。

在武周朝, 华严宗和新兴的密宗得到大力扶持。武后不仅赞助《华严经》的重译, 且尊华严宗三祖法藏 (643-712 年) 为国师。在华严宇宙观中, 卢舍那佛为诸佛之首, 享有至尊无上的地位。此种佛教观念先前已在龙门石窟奉先寺的造像群中体现: 奉先寺

**收稿日期:** 2022-02-01

**作者简介:** 王静芬 (1958- ), 女, 香港人。教授, 主要从事东亚佛教艺术研究。

① 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Lond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7-57;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2nd edition; Kyoto: 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2005.

建于672至675年间，寺中以卢舍那大佛为主尊，其巨型的造像超越法界诸尊（图1）。<sup>①</sup>佛国与现世的至尊合二为一：该佛像（宇宙佛）在形象及概念上均为佛土至尊，正如武后在人间君临天下的至高地位。随后，日本圣武天皇（Shōmu, 724-749年执政）主持修建了仿唐式的东大寺，该寺于752年开始供奉卢舍那大佛金铜巨像（图2）。<sup>②</sup>



图 1



图 1a

（图1 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672-675年，采自《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图版110；图1a 卢舍那大佛基座局部，采自《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图版114）

虽然卢舍那佛是华严教义中的主宰佛，学术界认为，龙门奉先寺和东大寺中大佛的形象应是以《梵网经》而非《华严经》为原本。<sup>③</sup>尽管《梵网经》或为在华撰写的伪经，但因其论及菩萨戒且引入卢舍那佛的概念，仍被视为是东亚重要的大乘佛教经典。《梵网经》描述了卢舍那佛的莲华藏世界。巨大的千瓣莲花从大海中涌现，卢舍那佛置身其上，每片莲瓣托起一个世界。卢舍那佛化身为一千尊释迦牟尼佛，各掌一世界（图3）。<sup>④</sup>龙门石窟的佛像底部虽有毁损，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大佛坐于巨大莲花之上（图1a）。该莲花有三层花瓣，每片莲瓣皆雕有佛像以及或为胁侍的形象。龙门大佛与

①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雕刻于石灰岩壁上，高17.14米，图版见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卷下。

② 有关圣武天皇建造东大寺的历史背景，参见Joan Piggott, *The Emergence of Japanese Kingship*,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2-279;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基座之上高15.73米，图版见John M. Rosenfield et al., *The Great Eastern Temple: Treasures of Japanese Buddhist Art from Todai-ji*,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86.

③ Serge Elisséeff, *Bommōkyō and the Great Buddha of the Tōdaij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Apr. 1936, pp. 84-95; [日]井上薰《奈良朝仏教の研究》，吉川宏文馆，1966年，第481-501页；[日]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下）：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仏教艺术》（232），1997，第80-83页。

④ Akira Sadakata, *Buddhist Cosmology: Philosophy and Origins*, Trans. Gaynor Sekimori, Tokyo: Kōsei, 1997, pp. 151-154; 图3线稿见[日]稻本泰生《东大寺二月堂光背本尊の“観音五十二仏図”》，鷺塚泰光编《日本上代における仏像の荘嚴》，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館，2003年。

东大寺大佛造型相似。<sup>①</sup>东大寺现存佛像为 17 世纪重铸，虽然 8 世纪的原像已被烧毁，但其带有线刻的莲座得以保存。每片莲瓣上都刻有巨大莲花，托起众多须弥世界及之上二十五重世界，释迦牟尼和诸胁侍菩萨端坐其上（图 2a）。



图 2



图 2a

（图 2 奈良东大寺卢舍那大佛，约 752 年，采自 *The Great Eastern Temple*，图 4；图 2a 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莲瓣上莲华藏世界雕刻，约 756-757 年，采自 *The Great Eastern Temple*，图 8）

然而，奉先寺和东大寺中卢舍那佛像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奉先寺的卢舍那佛两侧立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二金刚力士（*dvārapālas*）。此类九尊造像群历经一个世纪之久，从三尊逐渐演变为五尊、七尊，直至九尊的组合。在 6 世纪早期，“一佛二菩萨”的三尊造像非常普遍。到了 6 世纪末，多尊组合开始出现，例如隋代（589-618 年）的阿弥陀鎏金铜佛坛像，佛两旁为二菩萨及二金刚力士，构成五尊（图 4）。<sup>②</sup>在龙门石窟中，卢舍那佛主管着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等级化的“万神殿”。理想化的佛与菩萨神情安详、双目垂帘、法相庄严。相比之下，作为护法神的披盔戴甲的天王与体魄健壮的金刚力士，在“万神殿”中的地位较低，表露出凡人的情绪，如威武、愤怒等，彰显其庇护佛国的角色。帝王君临天下，一如卢舍那佛统率宇宙中的其他诸佛。由于帝王被尊为佛，所以护法神保护佛国的职责也延伸到俗世的王国。<sup>③</sup>

在东大寺的大佛殿中，卢舍那佛两侧的胁侍为菩萨铜坐像，西面右侧为虚空藏菩萨

① [日] 曾布川宽著，颜娟英译《唐代龙门石窟造像的研究》，《艺术学》第 7 号，1992 年，第 214-215 页；Amy McNair, *Donors of Longmen: Faith, Politics, and Patronag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p. 116-117.

② 鎏金铜像高 41 厘米，出土于西安，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图版见 Sherman Lee et al., *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New York: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1998.

③ 在亚洲佛教中，佛法治国是一种重要的理念。这种理念使佛教在众多地区获得国家支持。中国早在北魏时期，有政治职责的僧人已经开始推崇天子即佛。在日本，尤其是 7 至 8 世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佛法治国概念交织在一起。

(*Ākāśagarbha Amoghapāśa*), 东面右侧为观世音菩萨(可能为如意轮观音, *Cintāmanicakra Āryāvalokiteśvara*), 皆重铸于18世纪(图5、6)。<sup>①</sup>此外, 该殿内曾垂挂两帧大型绣帐(每幅高35尺<sup>②</sup>), 一帧描绘不空罽索观音(*Amoghapāśa*), 另一帧描绘观世音的本身相圣观音(*āry Āryāvalokiteśvara*)。东大寺雕塑与绣帐的造像组合, 以及具密教色彩、多头多臂的菩萨的地位之显著, 尤其是卢舍那佛由多身变化观音像胁侍, 很明显不同于奉先寺。同时, 东大寺的二月堂、三月堂(亦称法华堂)及其它殿堂中, 以变化观音为主尊。<sup>③</sup>本文将探讨华严教义与密宗神祇信仰在东大寺的结合, 并进一步论证此结合是对武后朝的新佛教思想的一种传承。



图3



图4

(图3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莲瓣雕刻线稿, 采自《東大寺二月堂光背本尊の‘観音五十二仏図’》, 图版6; 图4 隋代鎏金阿弥陀佛铜像, 584年, 采自 *China, 5000 Years*, 图版160)

武后除了支持华严教义之外, 也促进了密教的繁荣。密教源起7世纪的印度。7世纪初, 唐太宗一统疆域后, 唐朝在与印度愈加频繁的交往中, 接触到这种新兴的佛教思想。学界普遍认为, 陀罗尼经咒此前已出现, 但要到7世纪才开始大量涌现。7世纪中期, 印度僧人阿地瞿多(*Atikūta*)来华, 通过翻译《陀罗尼集经》而引入了一系列陀罗尼经典。如罗纳德·戴维森(*Ronald Davidson*)所述, 此集经已基本具备密教含义。<sup>④</sup>译经大师玄奘(600-664年)在645年结束了十六年的求法巡礼, 从印度返回大唐后, 也翻译了一些陀罗尼经咒, 其中有两例与变化观音有关。玄奘本人不仅信奉观音, 更深信其神奇的法力。

① 如意轮观音金漆木像高7.22米, 虚空藏菩萨金漆木像高7.1米。同期史料只提到了两侧胁侍菩萨为观音及虚空藏菩萨, 几世纪后才出现将此变化观音的具体形态视为如意轮观音的记载。然而, 也有学者支持将此观音暂定为如意轮观音(详见下文)。

② 一尺约为30厘米。

③ 戒坛院千手堂中, 原有千手观音像为主尊。

④ [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 东京: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1924-1934年, 第18册, T901; [美]罗纳德·戴维森在2008年春季于弗吉尼亚大学讲座上探讨了他对此集经的最新研究。



图 5



图 6

(图 5 日本东大寺虚空藏菩萨, 18 世纪, 采自东大寺出版明信片; 图 6 日本东大寺如意轮观音, 18 世纪, 采自东大寺出版明信片)

武周时期 (690-705 年), 由于武后推崇佛教, 众多佛经译者聚集于唐都洛阳的寺院。除前述僧人外, 有多位外来僧人把密教元素引入唐代佛教 (或称“武后之密教”), 其中包括来自印度中部的地婆诃罗 (Divākara, 又名日照, 613-687 年)、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人宝思惟 (Mañicintana, 卒于 721 年)、来自印度西北部的李无谄。另外, 印度菩提流志与汉僧义净也分别翻译过密教经文。<sup>①</sup>同时, 武后大力支持新引入的密教诸尊及相关仪轨。这些活动为唐朝在 8 世纪接受密教思想奠定基础, 其后遂有善无畏 (Śubhākarasiṃha, 637-735 年)、金刚智 (Vajrabodhi, 669-741 年) 及不空 (Amoghavajra, 705-74 年) 三位密教宗祖师在唐朝为皇室弘法。

与此同时, 龙门石窟出现了更多密教图像, 例如擂鼓台南洞的宝冠佛被视为卢舍那佛的密教形态。该尊像饰有高冠、璎珞、臂钏, 右手结触地印, 应是近代才被移至龙门擂鼓台南洞 (图 7)。<sup>②</sup>该像可追溯至 700 年前后, 正处于武周时代, 被认为是卢舍那佛的一种化身。戴宝冠的触地印装饰佛也可以视作释迦牟尼佛, 结合了菩提伽耶像与装饰佛像两个不同的图像。<sup>③</sup>华严教义与密教之间的关联性, 体现在两者都以卢舍那佛为主尊。

① 见 [日] 长部和雄《则天武后時代の密教》,《唐宋密教史论考》, 神户: 神户女子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 1982 年, 第 1-33 页, (原文刊载于《密教文化》(111) 1975: 第 28-52 页); [意] Antonino Forte, The Activities in China of the Tantric Master Mañicintana (Pao-ssu-wei 宝思惟: ? -721 A. D.) from Kashmir and of his Northern Indian Collaborators, *East and West* 34 Sept. 1984, pp. 301-345; [意] Antonino Forte, Brief Notes on the Kashmiri Text of the Dharani Sutra of Avalokitesvara of the Unfailing Rope Introduced to China by Mañicintana (d. 721), in Gu Chengmei, ed., *Buddhism and Buddhist Art of the Tang*, Xinzhu: Chuefeng, 2006, pp. 13-28.

② 擂鼓台南窟卢舍那佛雕刻于石灰岩壁上, 高 240 厘米, 图版见 James C. Y.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

③ 见王静芬著, 淦喻成、赵晋超译《触地印装饰佛像在中国的形成与传播》,《佛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第 18-52 页。

另外，长安也出现了数例由宝思惟在693年翻译的《大随求陀罗尼》木刻印本。这些梵语和汉译的印本最早的可追溯至8、9世纪。上述事例均体现了密教信仰在唐朝的传播。<sup>①</sup>



图7



图8

(图7 洛阳龙门擂鼓台南窟卢舍那佛，约700年，采自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图录图版192；图8 敦煌莫高窟321窟东壁十一面观音，7世纪晚期至8世纪早期，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3卷，图版55)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几身变化观音像在武后时期开始盛行。最早流行的是十一面观音 (*Ekādśamukhā Avalokiteśvara*)。<sup>②</sup>早在6世纪末，耶舍崛多 (Yasogupta) 已经把相关的陀罗尼经翻译成汉文。但从敦煌及唐都长安、洛阳的造像资料来看，造十一面观音像，须到玄奘的译本流传之后才广泛流行。敦煌321窟壁画的十一面观音像，可追溯至7世纪末到8世纪初，正是武则天统治时期 (图8)。<sup>③</sup>此菩萨具六臂，其十一面由下而上作3-5-2-1的锥状排列，不同于印度坎赫里石窟 (Kanheri) 中十一面作纵向排列的先例。<sup>④</sup>在敦煌，十一面观音像皆绘于东壁入口内侧的上方或两侧，他们在石窟中的位置显示出其作为护法的角色。

武后通过佛教巩固她的政治地位以及推进其政权的合法性。十一面观音在唐朝的盛行，与武后强调佛教神祇能保护国家的效益有关。神功元年 (697) 为对抗契丹侵扰，国师法藏建十一面观音坛场，诵经持咒以护卫国家即是著名的例子。武后于长安建光宅寺，寺中的多边形石柱，称七宝台，是其核心雕塑。<sup>⑤</sup>七宝台石柱已被毁，遗存至今的

①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11页，图版7a-d。

② 见 Dorothy C. Wong, *Early Transmission of Esoteric Images from China to Japan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Huaxue*, 9, 2008, pp. 1697-1719.

③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987年。

④ 见 [美] Tove E. Neville, *Eleven-Headed Avalokiteśvara: Chenresigs, Kuan-yin or Kannon Bodhisattva: Its Origin and Iconograph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998, 图9.

⑤ Chüan-ying Yen, *The Sculptures from the Tower of Seven Jewels: The Style, Patronage and Iconography of the Monument*,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6.

32 件浮雕石刻中，有 7 件是十一面观音立像，足以证明此观音的重要性。其十一面由下而上，作 1-5-4-1 锥状排列。这组观音造像强调正面性，身体直立呈圆柱状，腰肢纤细，腹部微凸，凌厉的线条塑造出紧贴身躯的衣褶。图 9 的菩萨像上扬的右手持有刻着“灭罪”二字的大印，可见此菩萨是灭罪忏仪的核心。<sup>①</sup>高宗（650-683 年持政）驾崩时，武后曾造一千幅十一面观音绣像以示悼念。<sup>②</sup>

除此之外，唐都也有其它 7 世纪末至 8 世纪初的十一面观音像例证，包括于西安（长安）尼寺遗址出土的汉白玉头像，以及洛阳龙门的石灰岩头像（图 10）。<sup>③</sup>后者现存日本，原是擂鼓台北洞入口旁刻的观音浮雕像的头部；这尊四臂观音与另一尊八臂观音相对，分处入口两侧。



图 9



图 10

（图 9 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唐七宝台十一面观音像，8 世纪早期，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1；图 10 日本大原美术馆藏原龙门擂鼓台北窟十一面观音像头部，8 世纪早期，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2）

另外两种得到武后推崇的变化观音是不空罽索观音和千手观音。虽然玄奘已翻译过与不空罽索观音相关的陀罗尼经，但在武周期间，宝思惟、李无谥和菩提流志又完成了三个译本（其后，菩提流志在 707-709 年间另译了一部长达三十卷的译文）。<sup>④</sup>尽管此时期不空罽索观音的图像没有留存，但有文字记录。693 年，慧智（印度婆罗门外交使臣

① 石制浮雕，高 85.1 厘米；图版见 [日] 奈良国立博物馆编《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2005 年；第 154-155 页。

② [日] 伊藤信二《古代の繡仏》，《日本の美術》（470）2005，第 18 页。

③ 汉白玉头像见成建正编《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4 页；龙门石灰岩头像高 53.5 厘米。

④ Dorothy C. Wong, *The Case of Amoghajīva*,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 2007, pp. 151-158; 王静芬著，陈哲萱译《不空罽索观音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5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17-52 页。

之子，生于大唐）在参观寺院壁画后作《赞观世音菩萨颂》。<sup>①</sup>此颂原为梵文，慧智之后将其译为汉语。颂中描述壁画中的菩萨左肩有黑色鹿皮覆盖，颈带具龙王的璎珞，象征王权，也正是不空罽索观音的图像特征。由此，我们能确认这是关于该尊菩萨的首次记载。此颂在结尾处赞扬武后，称她“善转金轮”。慧智也曾参与翻译一些旨在巩固武后政权合法性的经文，包括《佛说宝雨经》。<sup>②</sup>基于这个原因，意大利学者福安敦（Antonino Forte）提出，慧智撰文的意图在于宣扬武后统治的周朝是佛国的中心。因此，不空罽索观音在东亚的传播，可以说是源起于佛教王权与转轮圣王的观念。<sup>③</sup>



图 11



图 12

（图 11 洛阳龙门万佛沟千手观音，8 世纪早期，采自《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图版 253；图 12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立像，传由定惠于 665 年传入日本，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4）

同样被认为与武后有关的还有千手观音。《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的序品（智通译于 7 世纪）记录了一位印度僧人在佛授记寺的佛坛上绘制了一尊千臂观音像，并与该陀罗尼一起敬奉武后。此后，武后为进一步推广佛法，命宫女与工匠造千手观音的绣像与绘画。<sup>④</sup>此外，龙门万佛沟的北壁上刻有千手观音像，该像可追溯至 8 世纪上半叶（图 11）。

在日本，十一面观音也是最早出现的变化观音像。许多 7 世纪的此类观音像在日本得以留存，包括一尊 42 厘米高的彩绘木雕。该像应是求法僧定惠（Jōe）于 665 年返日

① 《大正藏》，第 20 册，T 1052，第 67 页第一栏第 29 行至第二栏第 11 行。亦见 Antonino Forte, Hui-chih (fl. 676-703 A. D.), a Brahmin Born in China, *Annali dell'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45, 1985, pp. 105-134; Maria Reis-Habito, *The Amoghapāśa Kalparāja Sūtra: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Studie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n Religions*, 11, 1999, pp. 39-67.

② 《大正藏》，第 16 册，T660。

③ Antonino Forte, *Brief Notes on the Kashmiri Text of the Dharani Sutra of Avalokitesvara of the Unfailing Rope*, pp. 23-24.

④ 《大正藏》，第 20 册，T1057a，第 83 页第三栏第 10 行。

时携回（图12）。<sup>①</sup>由此可见，求法僧在此类信仰及图像的传播中功不可没。

法隆寺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始建于607年，670年火灾焚毁后重建。法隆寺主殿堂金堂壁画中描绘了八尊菩萨，其中包括一尊十一面观音像（图13）。<sup>②</sup>该殿的重建于711年前后，殿内壁画也大致于同时期完成。这尊十一面观音立像对身体正面的描绘凸显其至尊地位，此种风格与武后在七宝台所塑菩萨像类似（图9）。

另有一尊唐朝的檀木九面观音像，为十一面观音的变化形式，于719年入法隆寺（图14）。<sup>③</sup>尽管没有明确记载，多数学者认为该像由学问僧道慈（Dōji，卒于744年）带回日本。因为此前他曾在702至718年间访唐（图15）<sup>④</sup>，于法隆寺学习法相宗教义。返回日本后，道慈在同济中备受敬仰，并于729年出任律师，是僧官中最高职务之一。道慈访唐时正值武后执政时期，他日后对奈良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详见下文）。



图 13



图 14

（图13 奈良法隆寺金堂十一面观音壁画，711年，采自 *Wall Paintings in the Kondo, Hōryūji Monastery*，壁画图12；图14 九面观音，于719年从中国请入法隆寺，采自《请来美术》，图版59）

十一面观音也是东大寺二月堂的主尊，确切来说是一尊秘像（secret image）。自752年起，以此观音为核心的忏仪每年举办，时至今日未曾间断。这种仪轨名为“十一面悔过”（Jūichimen keka）或“修二会”（shūnie），最初由僧人实忠（Jitchū，726? -

① 彩绘木像，高42.1厘米。

② 对法隆寺壁画的讨论见 Dorothy C. Wong, *Reassessing the Mural Paintings of Hōryūji*, in Dorothy C. Wong, with Eric Field (design), eds., *Hōryūji Reconsidered*, New 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8, pp. 131-190; 图版见 Ichimatsu Tanaka, *Wall Paintings in the Kondo, Hōryūji Monastery*, Kyoto: Benrido, 1951.

③ 白檀观音像高37.5厘米，图版见 [日] 小野胜年《请来美术》，奈良：奈良国立美术馆，1967年。

④ 道慈画像为绢本设色，高119.3厘米，宽49.2厘米。

815?年)发起。<sup>①</sup>实忠是僧人良辨(Ryōben, 689-773年)的弟子,良辨则是协助圣武天皇修建东大寺的开山祖师。武后及奈良时代的日本均推崇华严宗,而东大寺正是日本华严教义传习的中心。



图15 奈良额安寺藏  
道慈像(15世纪)  
(采自《古密教:日本  
密教の胎動》,图版51)

忏仪源自于古印度寺院,包括诵经、唱诵梵呗、供奉诸尊等。僧侣通过修持此类仪轨,不仅为个人,也为国家、皇室及一切众生消除过往罪孽。中土自6、7世纪开始修习忏仪;传播到日本之后,忏仪的举行主要用于为国家禳灾除疾。<sup>②</sup>由于各种变化观音像具有减轻众生苦难的法力,所以成为了忏仪的常见主尊。七宝台观音像(图9)右手举着刻有“灭罪”二字的大印即是一例。

东大寺二月堂中供奉一尊小型十一面观音像,尤为神圣,秘不示人。此像1667年于大火中烧毁,仅背光部分得以幸存。背光上刻有一位多臂主尊,显然是千手观音,四周环绕许多坐佛、菩萨及诸天;其中五十二尊佛像环绕在观音的上方,十四尊菩萨、梵天(Brahmā)、帝释天(Indra)、四天王及诸天环绕在观音的下方(图16、16a)。<sup>③</sup>观音及上方五十二佛通常被解释为善财童子(Sudhana)在寻求开悟期间参访的五十三位善知识。<sup>④</sup>善财童子游历参访的经历被收录在《华严经》八十卷译本中的最后一章——《入法界品》(Gaṇḍavyūha)。鉴于东大寺的建造及其卢舍那大佛与华严教义相关,这种观音(善财童子的老师之一)、五十二佛及诸天的组合体现了具密教色彩的变化观音融入华严思想。背光反面刻有佛界宇宙,包括须弥山及下方的地狱场景等(图16a)。

东大寺的三月堂中有一尊干漆不空罽索观音雕像,高度超过3.5米,可追溯至748

① [日]筒井英俊《二月堂観音と十一面悔过》,《奈良》(13),1930,第35-48页;[日]佐藤道子《东大寺修二会的构成と所作》,东京:平凡社,1975-1982年;[日]堀池春峰《南都仏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80-1982年,第1卷,第153-197页;Ryūichi Abe, *The Weaving of Mantra: Kūka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soteric Buddhist Discour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9-176.

② 有关中国灭罪忏仪的讨论,见Kuo Li-ying, *Confession et contrition 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du Ve au Xe siècle*, 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4;释大睿《中国佛教早期忏罪之形成与发展》,《中华佛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3-337页。有关日本早期灭罪忏仪的讨论,见Marinus Willem de Visser, *Ancient Buddhism in Japan: Sutras and Ceremonies in Use in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enturies A. D. and Their History in Later Times*, Leiden: E. J. Brill, 1935, vol. 1, pp. 249-409.

③ 现存背光材质为金铜,高226.5厘米。

④ [日]奈良国立博物館編《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動》,第141-142页;[日]稻本泰生《東大寺二月堂光背本尊の‘観音五十二仏図’》。观音像为金漆夹纆,高362厘米,图版见[日]水野敬三郎、岡田英男、浅井和春編《東大寺と平城京:奈良の建築・彫刻》,《日本美術全集》,东京:讲谈社,1990年,第4卷。

年前后，应是当时日本所塑最大的菩萨像之一（图 17）。<sup>①</sup>此像原安置于良辩的佛堂（原称金钟寺）内。良辩是一位华严学僧，在东大寺的建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尊八臂不空羂索观音额上有一眼，合共三眼。正双手于胸前合掌持一水晶，其他手中分别持莲花、锡杖及绢索。观音双肩加披一件干漆布料，代表鹿皮。雕像身后的头光与身光以金属镂空形式表现，其上附有火焰花纹，呈现厚重之感。菩萨面部表情威严，为密教诸尊之特征。



图 16



图 16a

（图 16 东大寺二月堂十一面观音像背光，8 世纪中叶，摘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68；图 16a 图 16 局部，其上可见千臂观音及五十二尊佛）

如前文所述，东大寺大佛殿中的一佛二菩萨塑像双侧原有两帧大型绣帐（每幅高 35 尺），分别绘有不空羂索观音与圣观音。<sup>②</sup>这些绣帐虽已佚失，但绣帐边缘的一千余字题记得以保留。题记表明，754 年孝谦天皇（Kōken 748-759 年持政；764-770 年再度即位，改称德天皇）将这些绣帐敬奉给她的母亲光明皇后（701-760 年）。显然，光明皇后（Kōmyō, 701-760 年）虔心信奉不空羂索观音。在此之前的 746 年也有一尊为兴福寺（藤原氏家庙）塑造的不空羂索观音像，1180 年大火后重塑。<sup>③</sup>如福安敦指出，不空羂索观音信仰传入唐代中国时，就与皇权以及转轮圣王观念紧密结合，进而与佛法护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些原因，武后极力推崇不空羂索观音及其他密教观音。半个世纪后，相同的观念在日本得以实践，并集中体现于东大寺。<sup>④</sup>

① 见 Dorothy C. Wong, *The Huayan/Kegon/Hwaōm Paintings in East Asia*, in Hamar Imre, ed., *Reflecting Mirrors: Perspectives on Huayan Buddhis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pp. 349-396; 王静芬著，陈哲萱译《不空羂索观音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5 卷，第 17-52 页。

② [日] 稻垣晋清《大仏殿曼荼罗観音図像：繡帳》，《観音の研究》，《奈良》（13），1930，第 27-30 页。

③ 光明皇后属藤原家族；[日] 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会编《兴福寺》，《奈良六大寺大観》，东京：岩波书店，1968-1973 年，第 8 卷，图版 12。

④ Antonino Forte, *Brief Notes on the Kashmiri Text of the Dharani Sutra of Avalokitesvara of the Unfailing Rope*, pp. 13-28.



图 17 东大寺三月堂不空  
羼索观音像，约 748 年  
(采自《東大寺と平城京：奈  
良の建築・彫刻》，图版 6)

下面我们将讨论为何选择(传为)如意轮观音与虚空藏菩萨作为卢舍那主佛的胁侍。早期记录中,仅提及观音和虚空藏菩萨作为大佛殿卢舍那佛的胁侍。直至几个世纪后,如意轮才被视为观音的形象之一。虽然没有相关记录显示武后曾造如意轮观音像,但在武周时期,确有若干如意轮观音陀罗尼的译文出现。<sup>①</sup>

随着频繁的中日交流,中土新译的佛经很快就传至日本。这种传播主要归功于学问僧,例如道慈和玄昉。玄昉(卒于 746 年)于 736 年返日,携回中土流行的约五千卷经文。这批经文在日本迅速传播。以《如意轮陀罗尼经》为例,它在 730 年代已流通于日本,应该与玄昉赴唐带回的佛经相关。<sup>②</sup>其他文本证据表明,当时许多佛教人物和王公贵胄都供奉特定尊像。众所周知,光明皇后发愿供奉不空羼索观音。她不仅在兴福寺造像,其女儿孝谦天皇也为她在大佛殿造菩萨像绣帐。另有学者提出,备受光明皇后信赖的高僧道镜(任太政大臣禅师,700-772 年)虔诚信奉如意轮观音;主持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开眼仪式的南印度僧人菩提仙那(704-760 年),也曾造如意轮观音像。<sup>③</sup>

不同于大佛殿卢舍那佛,其身侧二尊胁侍菩萨的塑造与当时两位杰出的比丘尼相关。这两位比丘尼在佛教活动中占有重要角色,与光明皇后及朝廷关系密切。观严(Kangon, 1151-1236 年)编撰的《东大寺要录》记载了两尊塑于 749 年的胁侍菩萨像:卢舍那大佛东侧的观音及西侧的虚空藏菩萨分别由比丘尼信胜(Shinshō)及善光(Zenkō)供奉建造。<sup>④</sup>大江亲通(卒于 1151 年)分别于 1106 年及 1140 年两度拜谒南都奈良七大寺,其著作《七大寺巡礼私记》中亦有对二位比丘尼的记载。研究显示,她们十分热忱于通过造像抄经等活动推广佛教思想,且与光明皇后关系非常密切。<sup>⑤</sup>信胜来自始建于 6 世纪的坂田尼寺。该寺与外来工匠社群相关,他们早期制造马鞍,其后转铸金铜佛像与其他工艺品。<sup>⑥</sup>善光是法华寺(Hokkeji)的住持;该寺建于 745 年,被尊为

不同于大佛殿卢舍那佛,其身侧二尊胁侍菩萨的塑造与当时两位杰出的比丘尼相关。这两位比丘尼在佛教活动中占有重要角色,与光明皇后及朝廷关系密切。观严(Kangon, 1151-1236 年)编撰的《东大寺要录》记载了两尊塑于 749 年的胁侍菩萨像:卢舍那大佛东侧的观音及西侧的虚空藏菩萨分别由比丘尼信胜(Shinshō)及善光(Zenkō)供奉建造。<sup>④</sup>大江亲通(卒于 1151 年)分别于 1106 年及 1140 年两度拜谒南都奈良七大寺,其著作《七大寺巡礼私记》中亦有对二位比丘尼的记载。研究显示,她们十分热忱于通过造像抄经等活动推广佛教思想,且与光明皇后关系非常密切。<sup>⑤</sup>信胜来自始建于 6 世纪的坂田尼寺。该寺与外来工匠社群相关,他们早期制造马鞍,其后转铸金铜佛像与其他工艺品。<sup>⑥</sup>善光是法华寺(Hokkeji)的住持;该寺建于 745 年,被尊为

① 《大正藏》,第 20 册, T1080, 菩提流志译; T1081, 义净译; T1082, 实叉难陀译; T 1083, 宝思惟译。

② [日] 石田茂作《写経より見たる: 奈良朝仏教の研究》, 东京: 东洋书林, 1930 年, 第 84-91 页。

③ 有关奈良时代如意轮观音的供奉, 井上一稔提出, 道镜的信仰比较笼统, 且无法确定他是否修行此菩萨的陀罗尼。然而, 菩提仙那的墓志铭上记载他曾敬造如意轮观音像。见 [日] 井上一稔《奈良時代の「如意輪」観音信仰とその造像—石山寺像を中心に》, 《美术研究》(353), 1992/1993, 第 1-16 页。

④ [日] 筒井英俊编, 观严(1151-1236 年)撰《东大寺要録》, 东京: 全国书房, 1944 年, 第 255 页。

⑤ [日] 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薩像の成立(下): 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 《仏教芸術》(232), 1997, 第 56-87 页。

⑥ 坂田尼寺的缘起与司马达等(Shiba Tatsuto)相关, 据传他从中国南部东渡日本。随行工匠在日本被称为“鞍作部”。其中一位名为止利仏师(Tori Bussshi)的工匠铸造了法隆寺的释迦像。

国分尼寺，与同样被尊为国分寺的东大寺地位相当。因卢舍那大佛巨像是奉圣武天皇之命所造，两尊胁侍菩萨的铸造可视为两位比丘尼以光明皇后的名义敬造。<sup>①</sup>



图 18



图 19

(图 18 大和文华馆藏唐如意轮观音金铜像，8 世纪，采自《金铜仏—中国、朝鲜、日本》，图版 174；图 19 大阪观心寺彩绘如意轮观音木像，9 世纪，采自《密教美术大観：如来，観音》，图版 166)



图 20



图 21

(图 20 东大寺藏《信贵山缘起》绘卷第三卷局部，12 世纪下半叶，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36；图 21 滋贺石山寺如意轮观音，约 10-11 世纪，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35)

然而，将东大寺大佛殿主尊东面（左侧）的观音像视作如意轮观音的概念出现于后期的记载。《东大寺续要录》（编纂于 1278-1292 年）中提到一尊双臂如意轮观音。

<sup>①</sup> [日] 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下）：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くって》，第 60 页。

比丘尼圆镜（Enkyō）于1304年编纂的《法华灭罪寺缘起》中也有关于该像的记录。<sup>①</sup>据圆镜记载，1253年主殿复修时，主尊像的底座下发现了如意宝珠、镜、剑、金、水晶等佛供，以及一块刻有题记的金牌（制作年代为759年）。<sup>②</sup>《七大寺日记》（大江亲通著）也将卢舍那左侧的观音记录为如意轮观音。<sup>③</sup>

现存最早的唐代如意轮观音像是一尊小型鍍金铜像，可能由赴唐求法的日本僧人于8世纪带回日本（图18）。<sup>④</sup>此六臂观音在莲花上呈自在坐（rājahlāsana），右腿屈起；虽多臂有损，仍可见其右上手扶额，左下手抚于莲座。日后，这尊铜像成为日本如意轮观音像的祖型，例如著名的观心寺9世纪木雕（图19）便是参照此铜像所造。<sup>⑤</sup>然而有图像证据表明，8世纪日本的如意轮观音可能存有其他形象。

平安时代晚期的佛像图像图录如《十卷抄》中，将如意轮观音描绘为双臂、半跏趺坐、左脚踏石；<sup>⑥</sup>此图象与绘于12世纪初的《信贵山缘起》手卷中描绘的大佛殿卢舍那左侧菩萨造形相近。画面中，东大寺大佛前有一位比丘尼在礼佛。在一扇半掩的门后，现出大佛东面（左侧）胁侍菩萨的部分身躯（图20）；<sup>⑦</sup>此菩萨半跏趺坐于莲座上，左手掌心外翻结与愿印（varada mudrā）。在相传为良辨所创立的石山寺中，也有一尊相同形制的佛像。<sup>⑧</sup>原像于11世纪毁于火灾，现存佛像依据原像重塑，有双臂，半跏趺坐于巨石之上（图21）。<sup>⑨</sup>因为《信贵山缘起》绘于1180年大佛殿焚毁之前，所以画卷可以证实大佛殿内菩萨像的原貌。在造像与绘画中出现的其他双臂如意轮观音像（图22）为我们将大佛殿卢舍那东面（左侧）的胁侍菩萨解读为如意轮观音提供了进一步

- ① [日] 太田博太郎、冈本茂男等编《大和古寺大観》，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第5卷，第140页第一栏至143页第二栏。在此我向提供给我其书稿的Lori Meeks表示感谢，该书现已出版为 *Hokkeji and the Re-emergence of Female Monasticism in Premoder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 ② 太田博太郎、冈本茂男等编《大和古寺大観》，第5卷，第142页第二栏；[日] 绀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下）：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第60-63页。
- ③ [日] 仏書刊行會編《大日本仏教全書》，东京：大日本仏教全書刊行會，1912-1922年，第120卷，第2页。
- ④ 金铜像高10.1厘米，图版见[日]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金铜仏—中国、朝鮮、日本》，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1987年。
- ⑤ Sherry Fowler, *Nyoirin Kannon: A Chronological Analysis of Six-armed Sculptural Examples from the Ninth Through Fourteenth Century*,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9; Cynthia J. Bogel, *Canonizing Kannon: The Ninth-century Esoteric Buddhist Altar at Kanshinji*, *Art Bulletin*, Mar. 2002, pp. 30-64. 彩绘木雕高108.8厘米，图版见[日] 佐和隆研、滨田隆编《密教美术大観：如来、観音》，东京：朝日新闻，1984年，第2卷。
- ⑥ [日] 奈良国立博物馆编《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37, 38；第166页。
- ⑦ 展现卢舍那大佛左侧观音足部细节，绘卷为纸本水墨设色，高31.7厘米。
- ⑧ [日] 绀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下）：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第61-63页。据传，滋贺石山寺是良弁在749年寻找东大寺金铜大佛所需的黄金时建立。石山寺主尊为如意轮观音。在成为真言宗寺院之前，石山寺与华严宗关系密切。
- ⑨ 现存佛像为金漆木像，高40.3厘米。

证据。<sup>①</sup>

虽然虚空藏菩萨在当时的中土佛教艺术中较为罕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找到东大寺大佛殿中造像与具体历史人物之间的关联。相传学问僧道慈曾在长安向密教祖师善无畏学习佛法。善无畏将《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译为汉文，<sup>②</sup>据说道慈后将此经文及其陀罗尼法引入日本。道慈在奈良佛教中的地位或许可以用以解读这尊虚空藏菩萨（在日本，虚空藏亦称求闻持）在东大寺的崇高地位（图5）。此外，道慈身边的一些僧人也与此陀罗尼法有关（见下文）。

在奈良佛教的形成中，道慈的作用不应被忽视。虽然他主修三论（中观学，*Madhyamaka*）与法相宗，但他在赴唐求法期间接触到了在唐都长安、洛阳盛行的佛教派别。返回日本后，因熟悉中土寺院及仪轨，他受命督导大安寺（又称大官大寺）在新都平成京（奈良）的重建工作。<sup>③</sup>迁址奈良后，大安寺在官方寺院中声名显赫，直至其地位被752年建成的东大寺超越。

道慈不仅在大安寺供奉了一尊千手观音像，而且为《千手观音经》作疏（现佚失）。由于道慈赴唐求法的经历，大安寺接纳了一批主修华严教义并于730至740年间抵达日本的渡来僧人；其中包括中土僧人道璿（*Dōsen*, 699–757年）、南印度僧人菩提仙那（见上文）、新罗僧人审祥（*Shinjō*, 8世纪）。以上三位僧人均精通华严教义，协助圣武天皇兴建东大寺，并促使朝廷采纳华严佛教为国教。

与道慈交往的人士中，不乏咒师以及变化观音法门的受持者。道璿经常主持《梵网经》的讲经，传说他归隐山林后修持的求闻持法是一种能增进记忆力的仪轨。此外，主持东大寺大佛开眼仪式的高僧菩提仙那曾奉造一尊如意轮观音像。菩提仙那为崇佛的皇室所青睐，由于他的影响，光明皇后赞助铸造东大寺讲堂的主尊千手观音巨像，其两侧胁侍为虚空藏菩萨和地



图22 奈良国立博物馆藏变化观音图像绘卷中如意轮观音像，平安时代（12世纪）（采自《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37）

① 学者对该观音身份未达成共识。例如井上一稔在1992到1993年的研究中指出，因为此类双臂菩萨持如意宝珠，所以在后期他们与如意轮观音产生关联，见[日]井上一稔《如意轮観音像・马头観音像》，《日本の美術》（312），东京：至文堂，1992年；井上一稔《奈良時代の〈如意輪〉観音信仰とその造像—石山寺像を中心に》，第1–16页。其他学者，包括田村寛康和紺野敏文，分别在其1979年与1997年的文章中认可此解释，见[日]田村寛康《东大寺卢舍那仏の両脇像について》，《仏教艺术》（120），1978/1979，第70–91页；[日]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薩像の成立（下）：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くって》，第56–87页。图像绘卷为纸本水墨，高30厘米。

② 《大正藏》，第20册，T1145。

③ [日]堀池春峰《南都仏教史の研究》，第2卷，第245–276页。

藏菩萨 (Kṣtigarbha)。<sup>①</sup> 紺野敏文 (Konno Toshifumi) 讨论大佛殿卢舍那佛、如意轮观音、虚空藏观音三尊的图像问题时, 认为圣武天皇造卢舍那佛, 光明皇后造二胁侍菩萨 (由比丘尼信胜与善光筹募资费), 而三尊造像构思的指导则归功于道璿与菩提仙那。<sup>②</sup>

此后, 空海 (Kūkai, 774-835 年) 向道慈的弟子学习虚空藏陀罗尼法, 该经历是他赴唐求法之行的缘起;<sup>③</sup> 可见道慈的影响力对于密教在日本的建立至关重要。虚空藏菩萨常表现为顶戴五佛宝冠, 右手持剑或结与愿印, 左手持宝莲, 上饰如意宝珠。此菩萨常结跏趺坐, 有时半跏趺坐, 一足踏莲花。菩萨背光呈月轮状, 如一幅 13 世纪的绘画所示 (图 23)。<sup>④</sup>



图 23



图 24

(图 23 京都醍醐寺藏虚空藏菩萨像图绘, 13 世纪, 采自《古密教: 日本密教の胎动》图版 32; 图 24 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大佛与其胁侍千手观音与药师佛, 8 世纪下半叶, 采自《原色日本の美术: 奈良の寺院と天平彫刻》图版 57)

卢舍那佛与密教菩萨的组合并不仅仅出现于东大寺中。在大安寺, 一幅卢舍那佛像 (30 尺高) 于 749 年被奉为主尊, 两侧胁侍为不空羼索观音绘像与千手观音绘像

- ① 虚空藏菩萨和地藏菩萨的并置平衡着华严宇宙中天与地, 见 [日] 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 (下): 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 第 81-82 页。根据《东大寺续要录》记载, 虚空藏菩萨与地藏菩萨像二尊在 747 年为讲堂所造, 而主尊像千臂观音则造于 755 年, 见 [日] 筒井英俊编, 观严撰《东大寺要録》, 第 100 页; [日] 太田博太郎《南都七大寺の歴史と年表》, 东京: 岩波书店, 1979 年, 第 294, 296 页。
- ② [日] 紺野敏文《虚空藏菩萨像の成立 (下): 东大寺大仏殿脇侍像と讲堂像をめぐって》, 第 66-82 页。
- ③ 据传, 道慈将求闻持传授给他的弟子善议 (Zengi, 729-812 年) 与庆俊 (Kyōshun, ? - 756-781 年-?)。善议将其传授给勤操 (Gonsō, 754-827 年), 后由勤操传授给空海。见 [日] 堀池春峰《南都仏教史の研究》, 第 1 卷, 第 432-457 页。
- ④ 图绘为纸本水墨, 高 89.9 厘米, 宽 67.5 厘米。奈良附近的一座山寺中, 有一尊 9 世纪木造虚空藏菩萨坐像, 半跏趺坐, 右手持剑, 左手持宝珠, 见《古密教: 日本密教の胎动》, 图版 29。虽其手印及持物与经典的描述并不符合, 但是如果这是菩萨的变化形式, 那么就可以和卢舍那佛东面 (左侧) 同半跏趺坐的如意轮观音坐像组成一双对应的胁侍。

(各 15 尺高)。<sup>①</sup>除此之外,中土僧人鉴真(Ganjin)于 759 年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中亦有一尊卢舍那佛,其西面(右侧)立有千手观音,东面(左侧)胁立药师佛(图 24)。<sup>②</sup>

道慈还与另一种华严艺术的传播有关——基于《华严经》所绘的“七处九会”。<sup>③</sup>《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以下略称为《大安寺资财账》)记载 742 年道慈与寺主僧教义(Kyōgi)等人为圣武天皇造绣帐两帧:一帧基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绘“大般若四重十六会”,另一帧基于《华严经》绘“七处九会”。<sup>④</sup>由于《大般若经》是中观学派的教义基础,而华严经则是华严教义的核心,这两帧绣帐的主题恰当地反映出当时大安寺的佛学流变。



图 25



图 26

(图 25 敦煌藏经洞出土华严七处九会变相图, 10 世纪, 现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MG. 26462; 图 26 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北壁华严经七处九会变相图, 10 世纪, 《敦煌石窟艺术: 第六十一窟》, 图版 100)

《大安寺资财账》中的这帧华严“七处九会”绣帐是日本有记载的最早一例。据唐朝文献,长安和洛阳的寺院中可见华严变壁画,但现今只在敦煌留存,多为中晚唐时期

① 此画在《正仓院文书》中有所提及,然而未见于后期文献; [日] 太田博太郎《南都七大寺の歴史と年表》,第 84、295 页。

② 佛像为金漆夹纻,卢舍那大佛高 303 厘米,图版见 [日] 浅野清、毛利久编《原色日本の美术: 奈良の寺院と天平彫刻》,东京:小学馆,1966 年,第 3 卷。

③ 见 J. Giès ed., Two previously Unpublished Paintings from Dunhuang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in The Arts of Central Asia: The Pelliot Collection in the Musée Guimet, English edition, trans. Hero Fries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derick Whitfield,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6, vol. 1, pp. 39-51, (The French edition 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la collection Paul Pelliot d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was 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4); Dorothy C. Wong, The Case of Amoghapāśa, pp. 151-158.

④ [日] 仏书刊行会编《大日本仏教全书》,第 118 卷,第 116 页。

所作(图25、26)。<sup>①</sup>根据实叉难陀所译《华严经》八十卷本,这些绘画多将“九佛会”分布于网格状平面,由象征卢舍那莲华藏世界的巨大莲花托起(佛陀跋陀罗的六十卷本《华严经》中仅提及八会)。通过仅存的8世纪敦煌44窟壁画(尚未对外公布),我们看到佛会的排列不像后期那样井然有序。壁画底部绘一池浮莲,壁龛前有巨大莲花石雕。关于“七处九会”的描绘,日本大安寺的华严绣帐是否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相似?虽然无从知晓,但根据《大安寺资财账》中的标题《一帐华严七处九会图像》,可以推断九会场景曾出现在绣帐上。

本文首先探讨华严佛教艺术在武后朝与圣武天皇、光明皇后朝中的异同。武后不仅支持华严佛教,也推崇密教信仰,尤其是变化观音。在中土,不同信仰流派的表达方式有所区分。而在奈良,变化观音信仰与华严教义互相融合。这种融合体现于东大寺大佛殿中卢舍那佛与不同形态的密教变化观音、虚空藏菩萨的组合,以及其他殿中作为主尊的变化观音。这种华严教义与具密教色彩信仰的结合,可理解为对半世纪前武后朝佛教思想的传承与演变。

本文英文版为 Dorothy C. Wong, *The Art of Avata saka Buddhism at the Courts of Empress Wu and Emperor Shōmu/Empress Kōyō*, in ed. Robert Gimello, et al., *Avata saka Buddhism in East Asia: Huayan, Kegon, Flower Ornament Buddhism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a Visual Cul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2, pp. 223-260. 本文的翻译与修改,得到以下各位的帮助:丁冷、薛同、曹梦鸽、淦喻成、马楚媛和樊华杰。

<sup>①</sup> 见 Dorothy C. Wong, *The Case of Amoghapūṣa*, pp. 151-158; 藏经洞出土七处九会图为绢本水墨设色,高194厘米,宽179厘米;第61窟壁画图版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第六十一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